

未转头时皆梦

——缅怀黄永玉先生

曹可凡

这些年,每每遇到挫折、困顿、烦闷,总会想起黄永玉先生跟我说的那句话:“人生旅途中难免会被坑绊倒,有人立即起身,掸掸身上的灰尘,继续前行;有人则一直蹲在坑旁,仔细端详,反复琢磨,何以会被坑所阻挠。前者或许会成功,后者必定失败。”于我而言,永玉先生就如同黑暗隧道里的一盏明灯,照亮了人生之路。
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初识黄永玉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末。这是他阔别上海二十年后,再一次来到这座令他魂牵梦萦的城市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我永远喜欢上海,虽然我年轻时时代的生活无一天不紧张、不艰苦,我仍然怀念它,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。”先生此行目的是要寻觅青春的印迹,踏访久远的老友。

他借居在影星王丹凤在“陕南鄂”的家,每天客人络绎不绝,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小小客厅充满了欢愉与温馨。我也跟着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去凑热闹,起先大家还有点拘束,但黄先生的洒脱、豪放和幽默,很快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。

老人健谈,从佛罗伦萨、巴黎谈到凤凰、张家界;从达·芬奇、罗丹,谈到齐白石、张大千;从莫扎特、普契尼、卡夫卡,谈到弘一法师、沈从文……不过,说得最多的,还是那些同命运、共患难之友。他左手托着烟斗,深深吸了一口,又慢慢吐出,一缕青烟袅袅婷婷,在屋内弥漫开来,思绪似乎随着轻烟飘回到过去的岁月。好大一会儿,才喃喃地说:“乐平、野夫、西庄这样的好人都去了。作为朋友,我却连去医院看看他们,陪他们说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常常责备自己在那个动荡的时候忘记了他们。我不是缺乏勇气,只是当时自己的事情也搅得乱七八糟无暇分身。要是他们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啊!我可以陪着他们在意大利的家里住住,开着车子四处转转。这明明是办得到的。哎!都错过了,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。”黄先生说得动情。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他在画册后记中一段话:“时光太快,令人莫名其妙。我竟然七十岁了,差堪得意,一生从未蹉跎时光;只是漫长的岁月中,情感用得真累。这铁石心肠的世界,把画册献给谁呢?献给自己吧!”怕老人过于伤感,大家连忙把话题扯开:“还好,我们没有把您错过。”

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,黄永玉先生始终被浓浓的情谊包围着。他见到了张乐平夫人冯雅音,见到了作家黄裳和辛迪,更出乎意料地见到了睽违近半个世纪的挚友殷振家先生。殷振家先生是一位正直善良、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,滑稽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和《苏州二公差》便是他的杰作。然而,他却一生坎坷,晚年妻子又重病缠身,生活窘迫。黄先生得知后,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画画,然后把这些画交到老友手上,再三叮嘱,需要用钱时尽可去卖。老人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朋友的情谊。

临别前,永玉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海亲历的一件小事。有一天,他乘坐出租车,当开车的女司机得知他是画家时,显得异常兴奋,说自己丈夫也喜欢画画,只是工作太理想,整天起早贪黑,赚那少得可怜的工资,勉强维持生活,自然也就无暇再拿起画笔。于是,她决定辞职,出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,以便让丈夫腾出时间去画画,寻找心中的艺术之梦。她说,丈夫勤奋,有天赋,只要坚持下去,相信他一定会获得成功。永玉先生听了,感动万分,抵达住所,立即送了本画册给那位女司机,并且要她转达“一个画画的”对“另一个画画的”的问候和致意。老人觉得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,却是他上海之行的额外收获——这显示了一座城市的胸襟与气质。“所以,我喜欢上海是有理由的。”他微笑着,眉宇间还夹杂着几分孩童般的淘气 and 天真。

香港回归前夕,我赴港拍摄春节特别节目,尽管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,但还是抽空给永玉先生挂了个电话,原以为他可能已经把我忘了,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那爽朗的笑声:“哈哈,你来香港了?那来玩啊!”于是,离港前一日晚上,如约前往永玉先生家拜访。由于司机不熟悉道路,走了不少弯路,待到永玉先生家时,已接近十点了。我连连向先生道歉,可他却把手一扬:“没关系,反正我也睡得晚。只是,茶有点凉了。”永玉先生的家位于中环附近的半山上,宽敞的会客厅有一长排玻璃窗,站在窗前,仰望苍穹,繁星满天,一轮明月挂在天际;远处摩天大楼的灯光闪烁。群星与灯珠衔接在一起,分不清哪里是星河,哪里是灯海。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永玉先生见我这副发呆的样子,笑了:“很美吧!可这样的窗口要是提早四十年该会有多好啊!我一生经历的窗口太多了,每一个窗口就是里程碑,一个纪录。”

先生饶有兴趣地跟我聊起有关“窗口”的故事。他说第一个窗口是家乡凤凰的老屋,“前面有树,中间有城墙,远一点就是山。阳光、雀鸟、老鹰,还有染房有个高架挂满二十条文布,那些色彩鲜艳的布一条条挂起,很好看,小时候,我

作者和永玉先生原配杜洽芬女士、本文



常趴在窗口痴痴地看……”他还风趣地把家乡比作自己的被窝。这被窝里自己喜欢的气味,别人未必习惯,但自己很喜欢。后来,永玉先生去江西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,他在二楼的房间有一扇很大的窗。先生每天清晨都倚在窗口或当窗时的女友,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溪上班。只要一看见女友的身影出现,他立刻吹起法国号以示欢乐。永玉先生后来写过一首长诗,记录他人生中第二个难忘的窗口。“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,一个为十八岁少年特别开放的、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,你,这个褐色皮肤、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口走来。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,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,我们相爱已经几万年。……”第三个窗口则是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,1948年,永玉先生与新婚妻子一起来到香港,住在一间很窄小的屋子里,仅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工作台。小屋有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窗,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榕树的树顶。他们夫妇买了漂亮的印度窗帘,来装扮“最值得自豪,最闷气的窗子”,还给它起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名字——“破落的美丽的天堂”。有一年,黄老来沪办展览,我曾专门约金庸先生原配杜洽芬女士与永玉先生相聚。两位老人共同回忆九华径时代的艰苦岁月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永玉先生携全家自港返京,与诸多大画家同住在一个拥挤的大杂院,“文革”后更是被赶到一个没有窗的小屋,永玉先生干脆画了一幅二米多长的《窗》,挂在破烂的墙壁上,“窗外山花烂漫,春意荡漾。”只要活着,故事就不会完;窗口虽美,却永远只是过路。眼前我们有一长列窗口,长到一口气也走不完。它白天夜晚都很美,既知过去如梦般的美,又真实可靠……明天的窗口,谁知道呢?”他说。

后来,北京“万荷堂”落成,永玉先生邀我前往做客。“万荷堂”占地约二十亩,大院东首有一大荷花塘,池塘四周轩榭错落、回廊曲折、清幽雅致、美不胜收。其中一座凉亭里有先生大幅水墨《荷花图》,苗子先生题句:“主人自写青山卖,朋辈同夸白雪辞。手把荷花来劝酒,步随芳草去寻诗。”西首那用青石、灰砖和原木筑成的建筑群,分前后两进,前面是永玉先生工作室,跨过门楣,一张八尺整张的“十万狂花如梦寐”屏风跃入眼帘,五彩斑斓、气象万千;东侧墙壁上则悬挂着先生刚刚完成的巨幅画作《老翁蓬勃图》,苍劲勃郁,耐人寻味。穿过工作室,径直往里,则是主人客厅和起居室,巨大的壁炉上摆放着他和他家人的照片,屋子中央是一圈矮沙发,好客的主人常约一些老友新知在这里品茶聊天。

湖南凤凰喜鹊坡的“玉氏山房”则是另一番景象。按黄先生的话说:“玉氏山房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如何安置那根来自三峡,需要三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的阴沉木。”推开两扇绘有采莲图的大铜门,可以看见一个约四百平方的客厅,那根重达七吨的阴沉木赫然矗立顶上,天窗洒下的阳光布满客厅的家具上,摇曳多姿、韵味无穷。坐在偌大的客厅里,先生跟我和太太回忆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生活状况。他说:“当年闯荡上海时,在寒碜之极的小包袱里,装着三本高尔基,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,一本钱穆,一本鲁迅,两本沈从文,一本哲学词典,四块木刻板,一盒木刻刀……”尽管从早到晚不停地刻木、画漫画,但仍一贫如洗。某日坐着有轨电车去愚园路,买票后须找回三分零头,售票员故意装

聋作哑。本来就囊中羞涩,恨不得一个铜板分成两半花,哪肯轻易罢休,他大声喝道:“找我三分钱!”售票员这才很不情愿地将零头找回,同时大骂“赤佬,瘪三!”时间过去数十年之久,永玉先生居然仍能记得那句“海骂”,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在凤凰逗留期间,先生每天陪我们到各处转悠,太太劝他不必如此,但老先生非常执拗,说:“下次你们再来,我就未必陪得动了。”我们听完不禁动容。

永玉先生素来与狗亲近,笔下小狗千姿百态,家中也总可见狗,有的温驯,有的看起来很凶悍。“玉氏山房”就有十余条狗,每日清晨大门一开,大狗小狗欢快地涌进客厅。我太太十分惧怕狗,见状魂不守舍。永玉先生给了她一根皮鞭,说,只要轻挥皮鞭,所有的狗都会知趣散开。太太一试,果然灵验。所以,无论走到哪里,太太总是一鞭在手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这画面让永玉先生忍不住笑了起来,问我太太:“你为什么怕狗?”太太答曰:“我怕有毛的东西。”先生脱口而出:“那你什么也不怕了?”太太先是一愣,随后也哈哈大笑。

尽管年事已高,永玉先生仍不时往返于京沪之间,兴之所至,常常即兴作画。有一次先生与沪上文化人聚餐,我偶然拿出反串京剧《龙凤呈祥》“孙尚香”剧照。先生一看,不觉两眼放光,“怎么像张君秋?好玩!好玩!我给你画一张。”说着,便脱下外衣,撸起衣袖,吩咐友人笔墨伺候。黄老让我坐在他对面,拿起一支小毛笔,气定神闲地画了起来。只见他一会儿看看我,一会儿低头勾线。不到半小时,画的轮廓便完成了。定睛一看,一张胖乎乎、面带笑容的大脑袋跃然纸上,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,神肖毕现。画完脸部,先生又画起了凤冠、霞帔。随后将朱砂、朱膘、石绿、藤黄等各种颜料一股脑儿挤到两个盘子里,一手拿照片一手用笔调颜色,涂抹上去,一面自言自语:“弄点印象派的色彩给你们看看。”前前后后画了将近两个小时,终于大功告成,最后还不忘记上几句妙语:“庚辰冬,写可凡‘孙尚香’剧照像,非可凡无此规模也,玄德焉能不怕。”

众人皆称赞好!

先生93岁那年的儿童节,我在朋友圈晒了一张童年照片,黑蛮哥感到有趣,便与先生分享。先生看后,不觉技痒,很快画了一张漫画。画面上如藕一般的大腿和胳膊,再配上一张圆乎乎的脸,脸庞两侧则是两团腮红,煞是可爱,活脱脱一尊无锡惠山泥人玩偶。与此同时,先生还留下一通手札:“可凡,给黑蛮哥早年照片,手痒,不忍不作反映(应),为半百人祝贺六一,此为第一遭。”

还有一年三月,赴京参加全国两会,与全国政协委员王安忆、赵丽宏、唐宁同住“太阳城”拜访。先生那天下午原本预约眼科医生检查眼底,但听说我们要去做客,立刻与医生调整时间,因为眼底检查需要放大瞳孔,这样的话,他就无法看清人影。待我们抵达时,发现他的画桌上放着早已画好的几张马,或引颈嘶鸣,或低首沉思;或回眸远望,或直视前方,任我们随意挑选,选完后再用题词。我的那张《奔马》题句:“人的功劳,马占了一半,却很少见他们名字。”

闲聊中,他还就我主持时的着装发表看法:“你不必每次都穿西装,穿一件皮背心也未尝不可。”老人家随即让黑妮姐寻找曾为其定制皮装的一位意大利老师傅,结果杳无音讯。几年之后,先生打来电话,说已在佛罗伦萨找到那位老师傅,嘱我赶紧告知衣服尺寸。不出两个月,一件精致的褐色皮背心便寄到我手中。先生对晚辈的呵护之情,毕生难忘。

永玉先生一生命运多舛,历经磨难,但他从不畏惧,从不气馁。他很欣赏这样两句诗“为了太阳,我才来到这个世界”。他说:“人生所有的遭遇我都受过,但我不哀叹,反而感到很值得。这辈子没有冤枉。等生命走到尽头时,我不要坟墓和墓碑,即便有个墓碑,上面也只要写三个字——‘太累了。’所以先生始终以淡然的心态看待生活,甚至不奢望别人能记住他:“鲁迅先生说,如果一个人死了,不活在人的心上,那他就真的走了。其实我觉得,这也不需要,不用活在别人的心里。不过,有点要注意,如果我没死透,千万别乱走。你们一定要针扎我一下,没有反应,就送走,放在电炉里,门一关可就来不及了。”

我问他,如果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,有人谈起他,希望人们如何评价?“这个混蛋!”说罢,黄先生的脸上露出狡黠却又纯真的微笑,这使我想起他在《假如我活到一百岁》里的诗句:“……我尝够了长寿的妙处,我是一个不逞是非的老头,我经历过最大的震动和呼吸,我一生最大的满足是,不被人唾骂,不被人诅咒,我与我自己混得太久,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好……”

如今,黄永玉先生早已远行。曲终人散,繁华落尽,脑海中飘过苏东坡的句子“休言万事转头空,未转头时皆梦”。然而,人已逝,物却留,我们仍然可以在那许多文字与画作中,感受到他的精神力量。

值此黄先生百年诞辰及逝世一周年之际,聊缀数语,以表无限缅怀之情。

2024年6月5日 16:30
于海上“留余斋”

时不,我很想读一点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书,虽然没办法清晰地辨别这书在所属领域的位置,也很难抵达专业级的精微妙处,却可以远远看看书中人的样子,比照下来,说不定可以校正自己某些方面的成见或偏见。

拿杜尚来说吧,我早就知道他在艺术领域的大名,但看他的作品,总是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十几年前,我读过一本从英文转译的《杜尚访谈录》,从书上几近于无的勾画痕迹来看,似乎没留下多少深刻印象(不是翻译问题,是因为自己程度太低)。这次读从法文翻译的《爆破边界:杜尚访谈录》(中信出版集团,2024年1月版),稍微感受到了谈话风格的“自然、通透、明晰”,便接连看了两遍,多少领会到了点杜尚的风采。

1887年,杜尚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,幼年在“非常福楼拜式的外省氛围中长大”,晚间,家人常一起下棋或演奏音乐。他的外祖家是位版画家,母亲也对绘画感兴趣,性情略有冷淡。他有两个哥哥,艺名雅克·维尔的长兄是不错的画家,以杜尚-维尔为人所知的二哥是很好的雕塑家,三个妹妹中的苏珊娜·杜尚也在绘画界有一席之地。

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作为公证人的父亲,他应该是那个时代走在上升通道的人。杜尚对父亲的职业偶有微讽,“政客的风格和公证人的风格是一样的。我还记得父亲家里的契约文书,那种语言风格简直要笑死人”。不过,作为公证人的父亲却不像契约文书那么无趣,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非凡。他不但没有反对子女从事艺术,还在他们成年后继续提供生活费用。不过,他提前告诉孩子们,成年后提供给他们资助,将来分配遗产时要先行扣除。“大哥维尔得到过很多资助,遗产一分未得,而我的小妹以前没有要过任何钱(她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),便领到了很多遗产。”杜尚非常赞同父亲的做法,觉得“应当向所有的父亲们这样建议”。

有两位年长自己十几岁的哥哥引路,杜尚不到二十岁就进入了艺术圈。他用不长的时间摸索了当时盛行的各流派技法,但没有进入特定的圈子。杜尚早期作品远算不上惊世骇俗,但表现人体处于运动状态的《正在下楼梯的裸女》,还是被1912年的独立艺术家沙龙拒绝了。他也从此不再期望加入什么团体,独自走向了另一条道路。

另走新路的杜尚,展示出艺术上强大的冲击力。即便我们不熟悉他的整体制作,肯定也听说过他那件被称为《泉》的小便池,知道他涂在蒙娜丽莎唇上的髭须。稍微多了解一点的,会想到他的女装照,提起他那块费时八年也没完成的《大玻璃》,还有那扇即开即闭的《拉里街11号的门》。妹妹苏珊娜结婚的时候,他送去的是一件被称为“不幸的现成品”的制作,“那是一本几何学概论,需要用几根细绳挂在他们孔达尔纳公寓的阳台上。风查阅书籍,亲自选择各种几何问题,吹散书页并将它们撕碎”。

即便在艺术界新潮不断的当时,杜尚的制作都因过于大胆而显得格格不入,虽然偶尔会引起反响,但他遇到最多的不满甚至抵制。有位女士向杜尚订制一件作品,他便制作了《为什么不打喷嚏》,“我把大理石立方体弄成方糖大小,把一个温度计和一块墨鱼的骨头放在一个涂成白色的小鸟窝里,我卖了三百美元。……这个可怜的女人接受不了,这东西令她发自内心地烦恼,她又把它转卖给了她的姐姐凯瑟琳,没过多久凯瑟琳也受够了”。最终,以相同的价格,这件不受欢迎的制作回到了杜尚的长期藏家阿伦斯伯格手上。

很难评判杜尚在艺术史上的地位,甚至,连“评判”和“艺术史”都是杜尚极力反对的概念。对他来说,从事制作,“并不是感情的宣泄口,也不是自我表达的迫切需求”,更不是为了名声或利益,而是要挑战关于艺术的成见,让人从思维的窠臼中挣脱出来。艺术中最大的成见,是视网膜霸权,杜尚用现成品挑战了这一霸权,让他从事的工作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的大脑:“重要的不是现成品的视觉问题,重要的是使它存在这一事实本身。它可以存在于你的记忆之中。你不需要去看它,就可以进入现成品的领域。……可以这么说,艺术品再也不可见了。它完全属于大脑灰烬,再也不会于视网膜了。”艺术品作用于视网膜近乎天经地义,短时间内,人们当然很难接受如此激烈的挑战。杜尚也明白,“我从来做不到什么能让人立刻接受的东西”。

在各种制作中,杜尚展示了他非凡的好奇心,不断突破着艺术的边界。这个访谈录的新译本被冠以“爆破边界”的标题,或许正是这个原因。有意味的是,跟不少天才艺术家把创造性的激烈带进生活不同,日常中的杜尚完全没有在艺术上展现的那种冲击力,相反,他看起来节制得近乎温和。我有点怀疑,杜尚成年后处事泰然的风度和文质彬彬的举止,部分跟家庭氛围有关,核心应该来自父亲的公正和母亲的冷淡,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去掉了其中的生硬和刻板,展现出睿智淡然的神态。于是,杜尚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,他平静地说,“我有很多朋友。我没有敌人,或者说非常少”。

此前,我最钦佩的人生态度,差不多是塞尚的“劳作,劳作,只有劳作”。这次读杜尚,我意识到,杜尚几近无为的慵懒,也非常令人心折。杜尚似乎无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,也不认为自己负有什么天然的责任。他在谈话中经常说,这个无关紧要,那个我不缺乏,“我不期待任何东西,也不需要任何东西”。这一切表现,并非因为愤世,而是缘于天性。他从不嫉妒,也从无怨,不觉得人生会留下遗憾。耗时八年的《大玻璃》在运输中震裂了,杜尚并没受到困扰,“带些裂纹更好,好一百倍。这就是事物的命运”。是这样吧,“我们可以接受一切并且依然保持微笑”。

对杜尚来说,人生最重要的并非艺术,更不是工作,“我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巨大的懒惰。相比于工作,我更喜欢生活和呼吸。……我的艺术就是生活;每分钟,每一次呼吸都是一件作品。一件不留痕迹的作品,既不属于视觉也不属于大脑。这是一种持久的惬意”。从事艺术和无所事事意义相当,不过是杜尚度过人生不同方式。从这个方向看,访谈录第二版的标题恰如其分——“荒唐时光工程师”。这个意思,亨利·皮埃尔·罗歇复述得好极了:“他最美的作品就是他对自己的使用方法。”

访谈开始的时候——1966年4月,两年多后杜尚就去世了——他就跟谈话对象皮埃尔·卡巴纳表示:“多亏了我的运气,让我可以滴雨不沾身。”译注云,这句法语谚语,直译应该是“我能够在雨水中穿过”(J'ai pu passer à travers les gouttes)。这就是杜尚吧,他从世界穿行而过,人间箭矢般的雨滴却一丝也没有淋到他身上。我相信,下面这句话不是宣示,而是他无比平淡的自我认知:“我拥有过绝对精彩的人生。”

「我能够在雨水中穿过」

黄德海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曹可凡反串孙尚香
(国画)
黄永玉

